

刘昶 徐立昕 张硕◎著

唐宋派时文研究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press.swjtu.edu.cn](http://press.swjtu.edu.cn)

唐宋派时文研究

刘 昶 徐立昕 张 硕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都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派时文研究 / 刘昶, 徐立昕, 张硕著.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643-2088-1

I. ①唐… II. ①刘… ②徐… ③张… III. ①唐宋派
—文学研究 IV. ①I20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9218 号

唐宋派时文研究

刘 昶 徐立昕 张 硕 著

责任编辑 张华敏

特邀编辑 陈正余

封面设计 水木时代(北京)图书中心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邮政编码:610031 发行部电话:028-87600564)

<http://press.swjtu.edu.cn>

北京广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成品尺寸:145 mm×209 mm 印张:7.25

字数:188 千字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43-2088-1

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028-87600562

序

唐宋派是明代嘉靖年间的一个散文流派，代表人物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反对以文采取代“道统”，主张“文道合一”的传统。唐宋派变学秦汉为学欧曾，易诘屈聱牙为文从字顺，主张文章要直写胸臆，具有自己的本色面目。唐顺之认为为文应该“直据胸臆，信手写来，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一样绝好文字”；王慎中也认为要“道其中之所欲言”，抒发作者内心的真实所想。唐宋派在上承唐宋古文的传统，下启桐城派散文的过程中，在文气由雅转俗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过渡作用。

当下学界对唐宋派的研究已有颇多成果。研究的着眼点主要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流派的文学思想、文学理论、诗歌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对其与阳明心学、科举文风、抗倭战争的研究。对唐宋派在特殊生存状态下的时文创作没有专门而成体系的研究，这说明学界对唐宋派时文的关注不够，研究力度不大。故笔者决心利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文、史、哲贯通的基础上，对唐宋派的时文进行深入、全面地研究。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明代诗文较唐宋诗文而言，文气下落，表现出一种由雅转俗的趋势。唐宋派的创作尤能体现这一特点，唐宋派在文气由雅转俗中起着非常重要的过渡作用；从文学流变的角度来看，唐宋派的时文创作借鉴古文手法。关于此点，前人已有论述，但只是概述，没有给出具体阐释。本书针对此点具体分析唐宋派的时文与古文互动的深层原因以及他们互相糅合古文与

时文的创作手法,是如何表现在他们的创作中的。具体概括为:他们的创作是“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把他们的古文拨开就可以看成是时文,把时文糅合也可以看成是古文。总之,由于特殊的时代造就了古文发展的特殊阶段——时文倾向,并与时文创作同时得到提升,这对“文学发展与创新”这个永恒的课题有着重大的意义。

本书所采用的时文,主要以《钦定四书文》(方苞等编,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为底本,同时也参照《可仪堂一百二十名家制义》(俞长城,清康熙间刻本),均属直接引用,不再标明具体的卷数和页码。至于书中其他所引书目,多选择学界公认较好的校注本。尚无校注本的,则取自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其他善本,在此特作说明。

本书分为上、下编内容,由刘昶、徐立昕、张硕三人合著而成。其中刘昶负责上编全部五章有关唐宋派成员考证、唐宋派与古文流派之演变、古文流脉的时变倾向、时文写作的古法讲求,以及唐宋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评价的撰写。下编由三人共同负责注释,张硕负责归有光主要部分的时文注释,徐立昕负责唐顺之和归有光剩餘部分的时文注释,刘昶负责茅坤和王慎中的时文注释。最后,由刘昶和张硕统稿校订。

本书从选题到搜索整理资料,从阅读文献到撰写初稿,从文字校对到最后统稿,面临重重困难。这是因为当前关于唐宋派时文的研究资料甚少,而可资借鉴、有利用价值的论著更是少之又少,没有前例可循。我们只能从浩如烟海的众多历史文献中,一点一滴地筛选出包含唐宋派时文的文学史料,这在无形中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不过,在这艰难而又愉快的探索过程中,我们毕竟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并把这本著作呈献在研究者和读者面前。对唐宋派时文的研究,我们只是做了明代一个流派时文创作的研究,这只

能称为一个开端,我们希望将来能够沿着它继续前行,取得更大的成绩。但由于我们学识水平不高,时间仓促,书中难免存在疏漏和不足之处,希望在今后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能够不断完善,同时也祈望专家和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四川大学中国民俗文化研究所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刘昶 徐立昕 张硕

2012年7月

目 录

上 编 唐宋派时文考论

第一章 唐宋派简介·····	(2)
第一节 归有光归属唐宋派的定性·····	(2)
第二节 唐宋派成员的宦宦生涯及时代背景·····	(4)
第二章 唐宋派与古文流派之演变·····	(9)
第一节 唐宋古文流派的演变·····	(9)
第二节 唐宋派创作的由雅转俗倾向·····	(12)
第三节 茅坤《八大家文钞》的制举功用·····	(17)
第三章 古文流脉的时变倾向·····	(26)
第一节 明代举业的现实功用·····	(26)
第二节 文道关系的古今演变·····	(30)
第三节 法统道理的时文倾向·····	(35)
第四节 绳墨之法与直抒胸臆·····	(36)
第四章 时文写作讲求古文章法·····	(41)
第一节 古文时文的法度相通·····	(42)
第二节 熟能通神与清正本色·····	(46)
第三节 古文气体与法度深细·····	(50)
第四节 顺任自然与讲究中轂·····	(52)
第五章 唐宋派的地位和影响评价·····	(57)
第一节 直抒胸臆与不拘格套·····	(58)
第二节 道学馀习与晚明俗情·····	(61)

下 编 唐宋派时文选评

凡 例	(66)
唐顺之	(67)
此之谓絜矩之道合下十六节	(67)
吾与回言终日一节	(72)
君子喻于义一节	(78)
季路问事鬼神一节	(83)
素隐行怪一章	(86)
武王纘太王二节	(90)
善必先知之三句	(95)
有故而去五句	(100)
匹夫而有天下者二节	(104)
牛山之木尝美矣二节	(108)
尽信书一章	(112)
可以言而不言二句	(116)
王慎中	(123)
不得中行而与之第一节	(123)
茅 坤	(128)
谨权量三句	(128)
周公成文武之德及士庶人	(135)
无曲防三句	(140)
归有光	(147)
大学之道一节(其三)	(147)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二节(其二)	(151)
生财有大道一节(其二)	(155)
诗三百一节	(160)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一章	(164)
所谓大臣者一节	(169)

性相近也一节	(174)
喜怒哀乐之未发二节	(181)
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	(186)
小德川流二句	(190)
权,然后知轻重,心为甚	(196)
父子有亲五句	(202)
天子一位一节	(206)
君子之于物也一节	(212)
参考文献	(217)

上

编

唐宋派文考论

第一章 唐宋派简介

关于唐宋派的成员问题多有不同意见,有从时文的角度,将胡友信列入唐宋派,如孔茂庆先生,其在《八股文史》中将胡友信列入唐宋派^①。笔者认为从时文的角度来看,胡友信的时文创作和理论观点与唐宋派一致,但从唐宋派总的理论和创作追求来看,胡友信不能列入唐宋派。对于唐宋派的成员这一问题主要的焦点集中在归有光的身上,如崔衡等人认为归有光不属于唐宋派^②,觉得归有光的理论与王、唐、茅有着很大的差异;还有人虽把归有光归入唐宋派,却认为归有光乃是唐宋派之异类,如黄毅的《明代唐宋派研究》就持该观点^③。虽然如此,笔者认为这些对唐宋派的看法并不完善,仍有进一步确定深化的必要,现谨申愚见如下。

第一节 归有光归属唐宋派的定性

笔者认为王、唐、茅、归有不同,纯属正常,由于他们在创作主张和创作意识上的不谋而合,笔者把归有光归为唐宋派的成员。原因如下:

第一,一个文学流派的成员,在横向上看,是同时存在的,有着共同的审美追求和创作体验;从纵向上看,有着相同的文学承继和文学开启,归有光之文受唐宋之文影响颇深。当然,公认归有光有

① 孔庆茂:《八股文史》,凤凰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崔衡:《试论归有光在散文史上的地位》,华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

③ 黄毅:《明代唐宋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着“龙门笔法”，其实，凡是后人标举散文旗杆者，皆标举司马迁之作，这点与唐宋派的主流倾向是不违背的。

第二，有些学者认为归有光之文充满情，王、唐、茅之文充满道。这样评价是不中肯的。归有光之文亦有道，只是各家所谓的“道”不同而已。在心学思想横流的嘉靖年间，归有光的文是最能体现阳明心学的平民化思想的，他的充满情之文亦是带有小说意味的散文创作，正是表现出其创作中的援俗入雅，这与王、唐、茅之创作思路实无二致。

第三，针对认为归有光与唐、王、茅在文集中找不到他们共同来往的证据，故主张归有光应该独树一帜。笔者认为，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如果是在理论和实践上保持一致性，那么也就不一定非要有诗文方面的唱和或是书信来往。总体而言，唐、王、茅、归四家对“文”“道”“理”“气”的认识是一致的，而且都有对“法”的尊崇。尽管各有侧重，但异中有同。黑格尔说：“一方面单纯的差异的事物虽表明为彼此不相干，但另一方面，相等与不相等却是一对密切相互联系的范畴，没有这一范畴，便无法设想另一范畴。这种从单纯的差异发展到对立的过程，即在我们通常的意识里业已存在，只要我们能承认唯有在现存的差别的前提下，比较才有意义；反之，也唯有在现存的相等的前提下，差别才有意义。因此假如一个人能看出当前即显而易见的差别，譬如，能区别一支笔与一头骆驼，我们不能说这人有了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一个人能比较两个近似的東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我们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①

归有光以“撞钟”心态为文，貌似与茅坤要求“中轂”存在矛盾，其实则不然，他们的不同是表现在人生哲学上的不同，归有光的撞钟心态是指万事不可强求，这与他援小说笔法入散文有很大关系，

^①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53页。

人生如戏,戏看人生;而茅坤之要求“中轂”的主要意思是告诫这些制举业的士子们要看清楚主考官的喜好,要不然,文作的虽好,也可能是背道而驰,结局不理想。无论是“撞钟”心态还是要求“中轂”都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们对时文创作的重视。唐、王皆是时文创作大家,对时文自是重视,当然唐顺之后期悟道而弃文的思想是个人思想的转变,这与其在创作高峰之时对时文的重视是互不矛盾的。所以,本论文论述唐宋派的基点是唐、王、茅、归四人。

第二节 唐宋派成员的官宦生涯及时代背景

从唐宋派成员的为官经历来看,王、唐、茅、归四人,虽都有应试中举做官的经历,但所担任的皆为品级相对较低的官职,他们虽有一些政绩,但并不显耀于世。这与他们所推崇的唐宋八大家相比而言,是非常逊色的。而且,后者为官不顺时,最惨的遭遇也仅限于谪迁,尚无罢官削职为民,永不叙用之忧;而唐宋派中唐、茅被“削籍”、王遭“落职”,“削籍”之责、“落职”之罪,对怀有建功立业之心的士子的打击,可想而知。归有光虽未受此责,但却是晚年才中举,这种人生经历使得他在六十岁之前,都不得不贯穿着考取功名的人生目标和时文揣摩,内心所受的煎熬亦是不言自明。虽然他们钻研时文以求登第入仕,但入仕后却与自己的政治理想背道而驰。这种人生经历,对他们的创作肯定有影响。他们推崇唐宋八大家,然而,他们并不能取得和理想对象同样的成就。况且,这些人的主要生活时代是明朝政治相对黑暗的时代,即嘉靖年间。嘉靖皇帝十八年不临朝视事,百官上奏之事,他亦不关心,这就严重影响了明帝国的政事决策,使整个明帝国的行政运转濒临崩溃。嘉靖二十一年十月的“宫婢之变”对嘉靖皇帝是个巨大的打击,更加重了他的残暴。

这种环境,仕是苦、隐亦苦,是仕是隐?对士子们是个严峻的考验,内心处在这种煎熬的环境中,如何自处是个非常矛盾复杂的

问题。这与他们转向心学来寻求内心的安慰,有很大的关系。王、唐、茅、归对时文的态度亦因此受到影响。写好时文虽能入仕为官,但国政昏暗,必然使自己无所建树;若不写时文,则无法实现“事君荣亲”的人生目标。这对他们来说,是个艰难的选择,这种社会背景也无疑左右其对时文的态度。

笔者以年龄为序,分别简介他们的人生经历。

四人中以归有光为最年长,但其却是最后一个中进士之人。《明史》(卷二百八十七列传第一百七十五)记载:“九岁能属文,弱冠尽通《五经》、《三史》诸书,师事同邑魏校,嘉靖十九年举乡试,”^①但“八上春官不第”^②,直至嘉靖四十四年中进士,“授长兴知县”^③。但因其“有所击断,直行己意,大吏多恶之”^④,故被“调顺德通判,专辖马政。明世,进士为令无迁卒者,名为迁,实重抑之也”^⑤。直至“隆庆四年,大学士高拱、赵贞吉雅知有光,引为南京太仆丞,留掌内阁制敕房,修《世宗实录》”^⑥,卒于官,卒年六十六岁。

其次,乃是唐顺之。嘉靖八年进士,刚过弱冠之龄就已中举,文武全才,学识渊博,《明史》(卷二百五列传第九十三)评:“顺之于学无所不窥。自天文、乐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极原委。尽取古今载籍,剖裂补缀,区分部居,为《左》、《右》、《文》、《武》、《儒》、《稗》六编传于世,学者不能测其奥也。”^⑦按照常理来说,可谓是前途无量,但由于其个性刚直以及政治见识不远,故仕途坎坷。这可能与他的处世哲学有关。《明史》曰:“座主张璁

① [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82—7383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同上,第4092页。

⑦ 同上,第5424页。

疾翰林，出诸吉士为他曹，独欲留顺之。固辞，乃调兵部主事。引疾归。久之，除吏部。十二年秋，诏选朝官为翰林，乃改顺之编修，校累朝实录。事将竣，复以疾告，璫持其疏不下。有言顺之欲远璫者，璫发怒，拟旨以吏部主事罢归，永不复叙。”^①“永不复叙”的责罚，对从小就接受入仕为官思想的文人来说，是何等的残酷与无情。直至“十八年选官僚，乃起故官兼春坊右司谏”。但因“请朝太子”，皇帝尚在，朝见太子，所谓何意，只落得“复削籍归”。唐顺之宦海沉沉浮浮，自是苦不堪言。倭患兴乱，唐顺之怀着儒家济世之精神，方又出世，《明史》曰：“倭躏江南北。赵文华出视师，疏荐顺之。起南京兵部主事。父忧未终，不果出。免丧，召为职方员外郎，进郎中。”^②他晚年再次复仕，顺之精通兵法、以身作则，自己冲在危险的最前面，故常常使敌人闻风丧胆。但由于常年生活在海上，再加上本来身体就差，《明史》记载：“时盛暑，居海舟两月，遂得疾，返太仓……顺之疾甚，以兵事棘，不敢辞。渡江，贼已为遂等所灭……力疾泛海，度焦山，至通州卒，年五十四。”^③

可以说，唐顺之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将自己最后的余光都抛洒在卫国大业上。他晚年对待时文的态度，这与其晚年之心境是紧紧不可分的，首先与其在晚年对理学的信仰有关，尤其是阳明心学的尊崇已深入骨髓。此外，还与他对现实的认识和思考有着莫大的关系。他在晚年看到倭患甚重，国家不安定的现状，使其对科举入仕、治国保民，已持相当怀疑的态度，直到完全不信服；也使他时文的社会作用，有与之前截然不同的看法。这是现实给他的感觉。在他看来，韩愈时代的“文”对现实的巨大影响，但在自己时代不可能产生如此之影响，从而，对“文”失去信心，故认为“文字”只是“债”，对自己的“病体”毫无帮助，待“复苏”后，“涂抹”“了债”，

① [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422—5423页。

② 同上，第5423页。

③ 同上，第5423—5424页。

然后“作一不识字人矣”，自己在饱读诗书的情况下，情愿作一白丁。可见，唐顺之对“文”的失望。

再次，乃为王慎中。《明史》（卷二百八十七列传第一百七十五）记载王慎中“四岁能诵诗”，少时即是聪明异常，其未辜负众人之厚望，于嘉靖五年，十八岁时就中进士，可谓是青少年便已有所成就，是年，回乡完婚。次年假满，正是意气风发之时，“授户部主事，寻改礼部祠祭司”，后“乃稍稍吏部，为考功员外郎，进验封郎中……因覆议真人张衍庆请封疏，谪常州通判。稍迁户部主事、礼部员外郎……久之，擢山东提学僉事，改江西参议，进河南参政”。后“侍郎王杲奉命振荒，以其事委慎中，还朝，荐慎中可重用。会二十年大计，吏部注慎中不及。而大学士夏言先尝为礼部尚书，慎中其属吏也，与相忤，遂内批不谨，落其职。”^①由于慎中不屑于奉迎上司，阿附权贵，早年在礼部供职时，得罪上司夏言，故“落其职”。慎中宦海浮沉十馀年，落职之时方才三十三岁。虽和唐顺之情况颇多类似，沉沉浮浮，但王慎中未像好友唐顺之一样，晚年出仕，而是居家专事著作，嘉靖三十八年病逝于家中，享年五十一岁。

最后，当属长寿者茅坤。坤生于正德七年，死于万历二十九年，享年九十高龄。茅坤文武兼长，雅好书法，嘉靖十七年，二十七岁时中进士，《明史》（卷二百八十七列传第一百七十五）曰：“历知青阳、丹徒二县。母忧，服阙，迁礼部主事，移吏部稽勋司，坐累，谪广平通判。屡迁广西兵备僉事，辖府江道。”^②有用兵之才略，“悉以兵事委坤，连破十七砦”，“民立祠祀之”。“迁大名兵备副使，总督杨博叹为奇才，特荐于朝”，但“为忌者所中，追论其先任贪污状，落职归。”^③

四人仕途生涯俱是相当短暂，王慎中和茅坤落职后，均没有再

① [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68页。

② 同上，第7374页。

③ 同上，第7374—7375页。

正式为官,只是后来茅坤入胡宗宪幕府,勉强算是再入官场,而唐顺之则十馀年未入官场,直至最后因抗倭复用,死于海上。只有归有光虽未有削籍、落职之苦,但其却是在六十高龄方才为官,而且还遭到降至为小吏的政治迫害,仅仅几年后,就死于任上,算是官场中,唯一有始有终、圆满之人。可以说,他们的人生经历,十分的曲折坎坷,这不可能不影响他们的创作,也必将在他们的作品中予以表现。

唐宋古文一脉沿承至明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明代经济的繁荣,使得时人不再以应举为唯一的生活出路。同时,也使得时人越来越多地关注自身的生活,这种倾向表现在大文学中,是通俗文学的兴盛。而表现在传统的正统文学中,是诗文的用语和内容趋向于市井化、世俗化,同时受当时享乐的社会影响思潮的文人们更少地关注“国家大我”,更多的是关注“自家小我”。这种倾向在唐宋派诸家中表现的也是非常明显,使得他们的诗文充满世俗感,而少雅正感,故其文章之气势在整体上和唐宋八大家相较而言,是更为和缓的,这种和缓倾向与当时之科举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元朝立国,虽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得到确认,但元代文人是没什么地位的。而且,科举考试断断续续,更是大大降低了儒家学说的影响。朝廷设立官学,虽表现出对儒家文化的推崇,但因其从根本上对文人的轻视,导致文人们不再汲汲于功名。从而,儒家之“出世”思想亦是大大降落,元代通俗文学戏曲的繁荣自是时代之必然。这种文学思路一路沿来,对明代的文学发展自是有很大的影响。在古文流变中,虽唐宋派的创作成就不能与唐宋八大家相提并论,但因其处在明代和古文发展的特殊时期,故唐宋派在古文流变的“由雅转俗”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过渡作用。